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〇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〇〇六—二〇一〇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

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事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目錄

前言 10

第1章 左翼終結 23

一、淺間山莊事件與一九七〇年代 25

二、「運動」大眾的終結 39

三、反越戰和平團體與婦女解放運動、反「復歸」論 54

第2章 富裕幻影 75

一、經濟高速增長的巔峰 77

二、消費社會與都市年青一代 89

三、從「重厚長大」到「輕薄短小」 102

第3章 家庭消解? 123

一、日本人意識的變化 125

二、郊區化與四世同堂大家庭的閉塞 135

三、走向虛構世界 148

第4章 地域開發的孑遺物 171

一、從反公害，到環境保護 173

二、地域開發與休閒地開發的結局 185

三、農村解體與對地域自治的摸索 205

第5章 「失去的十年」間 221

一、震災、奧姆真理教、泡沫經濟的破裂 223

二、從國鐵民營化，到郵政民營化 238

三、日益擴大的等級差別 257

第6章 立足於亞洲視點的後戰後史……………273

一、企業走向海外與產業空洞化 275

二、「海外」經驗、「日本」消費 285

三、對「戰後」的重新追問與日美關係 300

尾聲……………317

後記 323

參考文獻

大事年表 330

前言

何謂後戰 後社會

提及後「戰後」社會 (Post-Postwar Society)，首先得思忖一下，「戰後」終於何時？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卻並非只有一個。有人認為，隨著佔領期的結束，「戰後」似乎也早已結束了；也有人主張「戰後」結束於日本走向經濟高速增长的一九五〇年代末；似乎還可以這樣來認定，人們當真再也沒有了「戰後」這一意識的，那大概是一九七〇年左右的事了。而另一方面，到了九十年代這個被人稱作「失去」的年代，我們真的已經從「戰後」擺脫出來了嗎，無論是在日本與亞洲的關係上，抑或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上？這都是需要重新加以追問的。

比如，始於九十年代末的泡沫經濟破裂之後的長期不景氣，大量不良債權的處理，雇傭不安定感的持續擴大，護送船隊型金融體系的解體，在描述諸如此類的態勢時，所謂「二次戰敗」這樣的詞彙，便早已在傳媒那裡被炒得熱火朝天了。日本在日美經濟「戰爭」中「已再度敗北於」全球金融體系執牛耳者的美國，這樣的看法四處流傳，並致使類似的話語不脛而走。這種「二次戰敗」論，

與一九五六年《經濟備忘錄》中所宣示的，反映了正在走向高速增長的日本經濟的心態的話語：「莫非已經不是戰後了？」恰好形成了對照。

不過，從上述這一中間隔了四十來年時差的斷言裡，也頗可見出足以令人震驚的某種連貫性。一九五〇年代的中期，當日本人開始意識到「莫非已不是戰後了？」的時候，背地裡作為其前提的，乃是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庇護下，實現經濟發展的諸多條件均已一一具備：軍事負擔的解除，諸領域技術的讓渡，東南亞的原料和資源與日本的工業能力的兩相配合，還有便是，對戰爭賠償問題的政治性「解決」，所有這一切，都是致使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得以成為可能的前提條件。

在一九九〇年代的「二次戰敗」論看來，日本便是因為被向我們提供了戰後經濟發展前提的美國，生拉硬拽地強行納入了全球性市場體制，這才遭到了經濟重創的。將日本從「戰後」拯救出來的是美國，而導致日本再度陷入「二次戰敗」的也是美國。不管怎麼說，如果像這樣，自始至終是基於日、美關係的立場來看問題，那麼也許可以這麼說，「戰後」最初是隨著美軍佔領的終結而終結了的，嗣後則迎來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後戰後」時代，而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戰後」又重新被美國帶回了日本。

「戰後」即是準戰時

然而，對日本說來，「後戰後」乃是隨著佔領期的終結而到來的。不過，這一說法須得加以相當程度的限制才行。至少，在一九五〇年代末之前，美軍在日本本土設置基地仍是司空見慣的現實。日、美雙方經由「擁抱」而構築起來的佔領時期，則成為「五五年體制」及嗣後的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而佔領的終結，隨後卻又成為走向更具持續性的日美安保體制的契機，因而從佔領期到高速增長期，我們有必要將它們作為前後連貫的同一個「戰後」來加以把握。在整個世界史的範圍內，它們又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體制，即美、蘇之間持續不斷的準戰時體制，彼此相對應的。

總之，倘若從整個世界史來看，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所謂「戰後」，並非意味著「無戰爭時代」的到來，而是進入了一個被人稱作「冷戰」的新的準戰時體制的時代。當時的亞洲，便相繼發生了這樣的兩場大規模的戰爭，即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這種根本談不上是「戰後」的狀態，持續之久，竟逾時二十餘年。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倘若就其所已達到的亞洲這樣的規模來看，豈止是「後戰後」，就連「戰後」都算不上，簡直就是「戰時」。

而戰後的日本則從這些戰爭，尤其是朝鮮戰爭那裡獲得了特需^①的機會，從而構築起了日後經濟成長的基礎。在冷戰體制中，日本被安置在了充當亞洲自由主義經濟牽引車的位置上，得以實現了它的高速經濟發展。而讓人無法忘記的是，從「復興」到「經濟成長」，這一連貫、接續的日本「戰後」，便是與那種波及整個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達到了亞洲規模的「戰後Ⅱ準戰時」狀態，以及與支撐這一狀態的獨斷專行的開發體制之間，構成了互為表裡的關係。

更何況，一九六〇年代的經濟的高速增長，正如近些年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其實也就是那種經由戰爭時期得以強化了的所謂「總力戰」^②體制的一個最終局面。經由經濟的高速增長，藉助於技術、經濟以及所謂的新的民主主義這些簇新的象徵符號，日本人重新構築起了此前曾因戰敗而被粉碎了的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從而把有關「戰爭」的不祥記憶，推置到了歷史的彼岸，而當初的「戰時」體制，也便不打折扣地渾然化合為「戰後」的組成部分。從戰敗和佔領的數年間延續而來的經濟復蘇及高速增長，以及社會的重新建構，概而言之，這被人稱作

① 特需，指美軍在日本採購軍用物資。——全書腳註均為譯者註。

② 「總力戰」：不僅動用武力，而且動員全國在各個領域的所有力量，以用於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一體制曾為日本所竭力提倡。

「戰後」的整個過程，毋寧都有必要將其視為「戰時」的一種延續來加以把握。

「夢」時代 與「虛構」 時代

如果說「戰後」並非終結於佔領期的終結，那麼，它的存在究竟又持續到了甚麼時候呢？正如本叢書第八卷所表明的那樣，經由一個經濟高速增长時期，日本社會的容貌完成了它戲劇性的變更。

提及社會現實變化這一層面，那麼，由「戰後」社會向「後戰後」社會的轉換，也便與由見田宗介所命名的「理想」及「夢」時代的階段向「虛構」時代的轉換，呈現出彼此對應的關係。按照見田的說法，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〇年左右，這一新高速增长時代，現實的感覺是朝著這樣的目標在行進的，即致力於「理想」（既是社會主義的，同時又是美國式的物質富裕的）為現實；嗣後，至一九七〇年代的初期，事實上，在對實現了的物質性富裕頗感不適的同時，年青人依然還在繼續追尋著位於現實彼岸的某個「夢」。而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日本社會的現實感覺，則似乎變成了這樣一種情形，人們在「虛構」的地平線上謀生經營，原先的那種木已成舟的「現實」與本該存在於彼岸遠方的某物之間所構成的緊張，已經在他們的身上消失殆盡。這一時期的人與生活所被賦予的特徵，便是「到處漂浮遊蕩著那種替現實『除臭』的『虛構』的言說、表現及生活的技

法。」（見田宗介《現代日本の感覺與思想》）

見田所指出的「戰後」向「後戰後」過渡的過程中、現實感得以形成的那種平面轉換，在本書中，似乎將為眾多的實例所證實。在都市空間的層面，如果將一九五八年建成的東京塔視之為「夢」時代的象徵，那麼，「虛構」時代的象徵，則一九八三年建成開張的東京迪士尼樂園，顯然是非它莫屬的了。

一九六八年秋天，少年永山則夫隨集體招工來到東京就職，當他登上東京塔，一望之下，眩人眼目的普林斯 Hotel 的草坪、泳池，便在他腦際灼燒了起來，待他強行闖入到泳池邊上，為保安人員所警覺，遂在這裡發生了手槍連續發射的案件。永山的犯罪，是「夢」時代的一個負面，說到底，是一個無從實現大眾「夢」並被從中排除了出來的人，「夢想」破滅時所留下的軌跡。與之形成對照的，則是與此一案件時隔二十年後所發生的另一起連續誘拐、殺害幼女的案件：由於喪失了返回現實的通道，案犯宮崎勤的殺人行為，便都是在某種「虛構」的感覺中得以實施的。

現實存在面的鮮明反差，可以經由諸如此類的緣於年青人的社會性事件而得以認知。如果說在「夢」時代，把內含自我否定的契機推向極限的，即是發生在一九七一、七二年間的連合赤軍事件的話，那麼，發生在九十年代的，把「虛

構」時代的現實感推向極限的事例，那便是奧姆真理教事件了。正如本書所認同和援引的見田宗介、大澤真幸的看法並有所討論的那樣，「戰後」與「後戰後」之間，現實態勢的轉換，便集約式地呈現在了此類事件的比照之中。

家庭、都市、產業的變化

七十年代以來，我們生活世界的存在機制，轉換、過渡到了似乎只能用「虛構」一詞來加以指稱的地平線上，這是與以重工業、化學工業向信息服務業的轉換為重點的所謂產業體制的轉換相對應的一種格局。而置身在這一變化中的人們，他們衡量價值的尺度，與其說是偏向於「厚重高大」，還不如說更偏向於「輕薄短小」。概而言之，比起重大，人們更為偏好的則是輕巧。

如果貼近生活水準，例舉出七十年代所發生的主要變化，那麼，令人矚目的首先便是這樣一些變化，即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變成了低出生率、老齡化的小家庭；密集的都市居住人口紛紛轉移到了郊區。隨經濟高速增长，人口由農村向都市集中，這一進程，致使日本社會出現了人口失衡的問題：過於密集或過於荒疏。

經由七十年代過渡而越發趨於顯著的一個現象，那便是，比起向都市集聚的都市化過程，移居到四郊去的郊區化過程，更是將都市和農村，一併吞併在了

一個巨大無邊的大都市裡。郊區化的推進，先是催促四世同堂式大家庭趨於老齡化，隨後又被逼到了低出生率的境地，由此改變了家庭成員的平均數。而法律的一系列調整和完備，至少表面上是擴大了女性雇傭就業的範圍；七十年代之前，即便是普通的「職業主婦」，她所擔當的家庭性別角色，也都要比九十年代之後顯得更為的多樣。

全球化

八十年代之後，中央與地方在景觀外貌上趨於均質，男女被雇傭的機會表面上也越來越均等，但隨之而來的卻是結構性不平等的漸趨擴大。經由九十年代長期的不景氣，日本社會遂由原先的依託年功序列薪金制度和勞資協調作為其基礎的、相對說來等級差別並不是很明顯的社會，激劇地變成了另一種社會，即人們在社會、經濟方面的等級差別被迅速拉大，雇傭出現了大幅度的不穩定及非正規的狀況。當然，這並不是說七十年代就沒有等級差別，但由於社會整體「物質富裕」的這塊餡餅攤得很大，從而形成了覆蓋面甚廣的中等階級意識，而九十年代以來的日本卻正在走向這樣的社會，即人們清楚地意識到，曾經的預想其實並沒有達到，但在收入、資產和未來前景上，等級差別卻都已歷歷在目。

造成這一涉及社會結構根本變化的契機，毋庸置疑，那便是「全球化」。至七十年代初，如果把「經濟高速增长」看作是鏗入日本戰後社會的最大契機的話，那麼，就是把本書的標題「後戰後社會」置換為「『全球化』在日本的呈現」，這麼說也一點都不為過。

倘若著眼於世界性政治、軍事秩序，那麼，完全可以把「全球化」納入「後冷戰」體制變化的框架。只是這一「後冷戰」並非由一九八九年的戲劇性政治變動所突然帶來，它乃是七十年代初期，匯率轉換成為變動匯兌制之後，形成了巨量金融款項跨國界流通的局面，所必然帶來的變化的結果。八十年代，中南美等若干國家遭受了通貨危機的嚴重侵襲，其後不久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混亂，也都必須與始於七十年代的世界架構變動過程中所產生的若干危機，聯繫起來一併予以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是先發制人，在以資本為依託的結構層面上，它搶在了「後冷戰」的前頭，給現代世界制定出了根本的方向。

與此一世界秩序的變化相對應，遂致使八十年代的歐美和日本，在政策體系上，開始由國家體制的「福祉國家」向「新自由主義」轉換，這是一種根本性的巨大轉換。最初是一九七九年的英國戴卓爾政權，緊接著是一九八一年美國列根

的上台，以及一九八二年中曾根政權的誕生，船舵被大幅度地扳向了新自由主義的航線。

而在「後戰後」，自民黨的保守政治，則由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至田中角榮的「列島改造」所力倡的福祉國家型的利益分成式政治，逐漸轉變為中曾根康弘至小泉純一郎所倡導的以「民間活力」和「規制緩和」為軸心的新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這一政策的轉換便意味著，在本該向地方和農村返還利益的所在，拉動選票的機器卻反而暴露出了其系統上的破綻。在日元急劇升值的九十年代，眾多的產業紛紛搬離我們所置身的這個列島，而後，眾多失去了生路的地區及為數甚眾的老齡化人口則被殘留了下來。

面向新的 歷史主體

所謂的從「戰後」到「後戰後」，便貫穿於本書所處理的各不相同的變化之中，並使其彼此相關相通，它並非是某個時代的「始」，毋寧說是「終」。首先，它是以暫先不問孰為保守孰為革新為前提的福祉國家體制的終結；由於這一體制是從戰爭時期的「總力戰」體制那裡延續下來的一種被組織起來的東西，因而這裡所終結的，既是「戰後」，同時也是「戰時」。其次，「後戰後」時期，與外在自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表 從「戰後」到「後戰後」

	核心	戰後社會 (1945—1970年代前半期)	後戰後社會 (1970年代後半期至今)
支配體制	世界秩序 國家體制 歷史潮流	冷戰 福祉國家 經濟高速增長	後冷戰 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
政治與變革	政權 口號 貪污事件 社會運動	從池田勇人到田中角榮 從「所得倍增」到「列島改造」 Lockheed事件(1976) 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針鋒相對的政治)	從中曾根康弘到小泉純一郎 民營化與規則緩和 招聘事件(1988) 女權主義與生態學(生活政治)
產業與環境	先端產業 社會風潮 雇傭形態 環境問題	重工業、化學工業 重厚長大 年功序列與日本型經營 公害問題	信息服務產業 輕薄短小 裁員與非正規雇傭的擴大 地球環境問題
家族與地域	家庭 地域的變化 社會構造	四世同堂式大家庭 都市化 差距縮小(差距不明顯)	低出生率、老齡化 郊區化 差距擴大(差距明顯)
社會意識	時代意識 標誌性建築 殺人事件 社會事件	「夢」時代 東京塔 連續槍擊案(1968—1969) 永山則夫 連合赤軍事件(1971—1972)	「虛構」時代 東京迪士尼樂園 連續幼女誘拐殺人事件(1988—1989) 宮崎勤 奧姆真理教事件(1995)

六十年代末，「公害」成為最大的社會問題，各地由此發起了大力保護環境的運動，嗣後不久，這一潮流便與所謂的地球環境問題的全球性課題融合為一體。第三，內在自然也在「後戰後」時期有了很大的變化；人們不僅必須直面這樣的危機，即此前一直作為自己人生基石的共同體的趨於

崩潰，並且，甚至連自身的現實存在感，也正如前面所述的那樣，正漸次喪失於「虛構」。

在這一過程中，怎樣的一種新的「始」，才是可能的呢？而新的「始」，又與開闢了這個新的時代的新的歷史主體的形成，彼此無法切割分離。

本書以較多的章節注目於社會運動的擔綱者。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否定，終至陷入了孤絕之境的？反越戰和平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還有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從其牆垣的縫隙間，又能發現怎樣的新的主體生成的可能呢？地域性的歷史景觀，保護自然的地方性運動，又會孕育出怎樣一種與締造新城鎮運動密切相關的主體來呢？在日趨擴大的等級差別之中，被邊緣化了的勞動者們，又能否重新團結一致呢？一方面，讓美國這道鎖卡給拴住了手脚，難以脫身，另一方面又被裹挾進了日漸空洞化的日本社會的現場，處在這樣的境況之下，與亞洲的人們的思想結合為一體的歷史主體，有望生成得了嗎？筆者希望在仔細關注諸如此類的問題、關注這些使得主體得以艱難生成的諸種前提條件的同時，好好思索一番。



突入前夜，待命的機動隊所臨對的淺間山莊的遠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每日新聞社)

一、淺間山莊事件與一九七〇年代

遊覽勝地

邊緣

坐上前往長野的新幹線，從東京出發，只需一個來小時，從輕井澤站下車，走出舊輕井澤街市對面的南出口，那裡鱗次櫛比的一流品牌商家，多得令人頭暈目眩。這一經營著輕井澤普林斯頓賓館的直銷折扣店購物中心，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國的一流品牌商家，每逢週末或是遊覽旺季，前來購物的客人總能滿載而歸。所謂直銷折扣店，實際上便是一流品牌的店家，對過了流行季節的商品作削價處理，以便消減庫存量。海外一流品牌是日本人所夢寐以求的，八十年代以來，專門銷售此類商品的店舖，也便開始彰顯在了人們的眼前。於是，打著諸如只需花費很少的錢便可買到一流品牌的商品的廣告招牌，將不下數百家的店舖匯集在了一起的超級大型購物中心，便在輕井澤、御殿場、泉佐野，高速公路出入口附近及遊覽休閒地，被絡繹不絕地修建了起來。

八十年代以來，消費的社會化在日本被不斷地推進著，直銷折扣購物中心，便是以商品的檔次來劃分社會的等級，並以此作為象徵，將促銷一流品牌的消費推向極致的一種大眾性的形態。在讓人不知饜足地從高檔商家購買到便宜商品的同時，也讓他們憧憬和渴望著的那種本來惟有在海外旅行中才能體驗到的漁獵一

流品牌的感受，那種非日常性的感受，由此而變得日常化了。它讓人們從它這裡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個如此龐大的消費群體的存在。

輕井澤南口的直銷折扣購物中心，是日本國內體量最大的一處。再往南去的那一大片地面，則為「輕井澤七十二高爾夫」球場所佔有。這片土地原先被稱作「地藏之原」，是塊濕地，戰前即已為堤康次郎所購得，被用作賽馬場和飛機場，後來才修建起了高爾夫球場，並在我後面將講述到的淺間山莊事件發生的前一年開業，翌年，即發生山莊事件那一年的1972年，經由擴建之後，則成了一個擁有七十二個球穴的高爾夫球場。

由該高爾夫球場再朝外延伸，周邊便是人稱LAKE NEW TOWN的大規模的分售別墅區域用地。據經營該別墅用地的LAKE RESORT會社的統計，如今，即二〇〇七年，整個別墅用地的規模，約為東京都中央區一半大小，達四百四十一萬平方米，分售別墅的數量為三千處，管理別墅的數量為一千七百處。別墅地的入口處，則有一個模擬歐洲萊芒湖、竭盡附庸風雅之能事的人工湖，按法國古城仿造的一家三越時尚館，也已於一九七四年開業。據他們說，七十年代，新城區的分售地塊，在輕井澤屬於價格便宜的別墅，經由全國境內的三越百貨店，已相繼為顧客所購買。

這麼說，輕井澤的南側，與戰前即已開始開發的北側迥然相異，是一片在戰後經濟高速增长以及隨之興起的休閒旅遊熱過程中，被相繼大規模地開發出了賓館、大型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及別墅分售地塊的區域。

一九七二年二月，作為新左翼運動的悲劇性的終結的象徵，被電視作了劇場化處理的事件，即連合赤軍的淺間山莊事件，便恰好發生在這 LAKE NEW TOWN 中間，這塊其後不久便拓展成了類似於跨度甚大的主題公園空間的地域的一角。

轉向後 戰後的 臨界點

那麼，這淺間山莊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此一連合赤軍事件，通常包括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間的兩件事情，即山嶽基地發生的一起集團性濫施私刑與殺人，以及在淺間山莊與對手警方機動隊間的槍擊戰。如果按時間順序來梳理，那麼，先是稱之為「總括」^①的、即對十二同伴施暴並將之殺害的殘忍事件，其結果，便自然引出淺間山莊的槍擊戰。據該事件當事者自己的供詞，山莊槍擊即是由集團性殺害同伴的事件

^①這裡的「總括」，似含有總結經驗及一攬子徹底解決問題的意思。

所引發，這一點是明白而又順理成章的。隨事件全貌趨於明朗，就連明確表示支持淺間山莊槍擊戰、認定它是反抗體制的革命行為的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們，也都不得不緘默無語了。連合赤軍事件的發生，象徵著始於六十年代的新左翼運動的決定性的失敗。

正如為其後諸多的現場查證和核實工作所揭明了的那樣，這一連合赤軍事件，便是六十年代的青年的感性與運動，將業已內在於自身的邏輯推向縱深時，所導致的一個可能性結局。成了「總括」犧牲品的遠山美枝子和金子美緒等人，當然，也包括事件的主犯永田洋子和森恆夫在內，他們的心情，喚醒了連合赤軍的一撥人，而人數較之六十年代的那代人要遠為眾多的年青人們，也與這樣的心情是相通的。揭明這一同時代性，並進而弄清楚，將他們追逼到那種悲劇性結局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歷史狀況和群體性邏輯？這一過程，便表明了由戰後轉換為後戰後的一個臨界點。

連合赤軍 的誕生

當時的歷史狀況便是如此，而作為事件當事者的連合赤軍，即是隨永田洋子、坂口弘等人的第二代革命左派及森恆夫等人的第二代赤軍派的相繼被捕，被追逼得走投無路，這才於一九七一年合併、誕

生的一個組織。

一方面，革命左派是由原「社學同」（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的簡稱）的河北三男等人，聯手匯合起被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日共開除出黨的原日共神奈川縣委員會中的部分成員，所建立起來的一個組織，他們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將反美基地的鬥爭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在隨後從河北手中接過了實權的川島豪的領導下，一九六九年九月，以阻止愛知揆一外相訪美的鬥爭作為契機，他們傾其全力，傾向於暴力抗爭，展開了諸如從工程現場盜取甘油炸藥這樣的過激行動。川島則因此而遭到逮捕。繼川島之後的永田、坂口等第二代革命左派，則籌謀襲擊警察，奪取槍支，闖入槍械店舖劫掠槍支、彈藥，越發奮勇地走上了這一過激路線。

另一方面，赤軍派這邊，則由鹽見孝也等人所組成，他們是從六〇年安保中曾領導過全學聯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間，因主張更為激進的武裝鬥爭而分裂出來的一派。赤軍派的基本特徵，他們的世界革命的路線，與其說是準備將實力消耗在與日本國內的官廳、警察的抗爭上，還不如說，是在更希望與海外諸多革命勢力緊密攜手並進這一點。他們計劃將自己的同伴送往海外革命基地，讓他們在那兒接受遊擊隊訓練，從而構築起一個全球性的網絡狀的武裝格局。為此，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因抗爭而遭到大範圍逮捕之後，一九七〇年的三月，作為該

組織中樞的田宮高磨等人，遂以策動綁架日航「澗號」飛往北朝鮮的劫機事件而震驚了全世界。不久，重信房子等人也離境前往巴勒斯坦，在PF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戰線）基地籌建日本赤軍。

諸如此類的，主要成員或是被捕入獄，或是向海外基地轉移，致使國內的赤軍趨於空洞化，那些殘留在國內的同伴，遂不得不接受第二代領導森恆夫的指揮。森恆夫在宣佈「出於革命目的，搶劫是可以被允許的」這類極為怪異的「徵用、動員邏輯」的同時，指揮手下襲擊郵局、銀行，奪取資金，然而，這麼一來，也便致使被逮捕的同伴有增無減，整個組織陷入了被窮追猛打的窘迫之境。

「革命戰士的共產主義化」

儘管在意識形態內容上，革命左派與赤軍並無多少可以交集的相同之處，但採取激進的暴力鬥爭手段，自行籌建軍事性的組織，以及有威望的領袖型的成員同時被捕入獄，從而只得由力量與經驗均尚未成熟的第二代出來全面接手，在這些方面，他們又是彼此相通。還有便是，革命左派雖然資金枯竭，但因成功襲擊槍械店舖而擁有充足槍支、彈藥，而赤軍派不乏資金與知識，但卻並不擁有武器，彼此之間恰好又有互補的一面。

當被逼到了窮途末路，迫使這激進而又性質迥異的兩派不得不攜手聯合的時候，來自革命左派內部並早已為他們所習以為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對赤軍派的森恆夫說來卻不能不意味著強人所難，於是，通往悲劇性結局的道路便由此起程了。

其後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的整個過程，據說其肇因，即緣於革命左派領袖永田洋子，以行為舉止過於女性化為由，批評、責難赤軍派遠山美枝子的那一刻。對個人的生活態度，對同一陣營的人，如此疾言厲色的公然指責，這在赤軍派是從來沒有這樣的傳統的。赤軍派領袖森恆夫深刻地接受了永田洋子之於遠山美枝子的此番批評，並由此形成了「革命戰士共產主義化」這一勇敢面對、絕不退避的理論。這與其稱之為理論，還不如說更帶有實用性技術論的色彩，旨在努力責成革命軍戰士對同伴的弱點，毫不留情地相互提出批評，從而使每一個人最終克服弱點。也就是說，「革命」不只是停留在社會變革的層面，革命戰士還必須人人經受得住人格上徹底的「共產主義化」的歷煉。

正如帕特里西亞·斯坦霍夫所分析的那樣，此時此際的「共產主義化」概念，其內在實質是曖昧不清的，而組織也顧不上去弄清楚它，便被賦予了諸如這樣的動機：「為成為更優秀的共產主義革命戰士，人人都得自行批判自身的小資

產階級行為，並將之拂拭乾淨。」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便動用了一種類似於採用心理療法的「高揚集體意識」的做法，以作為實施的方式，由於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對各自自我的固執作出集體性的批判，以便從自身內部來破除掉各種自我的軀殼，因而在同伴之間，他們的自我，是暫時置身在毫無防備的狀態之下的。他們一邊流淚，一邊坦白自己的歷史，自己以往的「秘密」，深信這便是為了「共產主義化」而努力改造自己的一種方法，並且，森恆夫還向他們發出了這樣的一道命令，在沒有完成自我改造的任務之前，誰都不准貿然出山！從而營造出一種大門緊閉的閉鎖狀態。閉鎖在裡邊的人們，雖然共同擁有著真誠的自我改造的熱情，但對於獲得改造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狀態，卻根本無從描摹。因而，只有「把從過去到現在的所有個人思考及行為一概予以否定」，才有可能「把日本的小資產階級的學生改造成為革命的戰士」。（帕特里西亞·斯坦霍夫：《通向死亡的意識形態》）

致人死 地的自 我否定

北田曉大指出，連合赤軍的這一「共產主義化」，將六十年代學生運動所共同具有的、涵蓋面甚廣的「自我否定」的情緒，推向了極端。所謂自我否定，乃是「一種反省方式，即通過對理應受到唾棄的自身內面作出毫不躲閃的逼視，從而達成否定性人格確認的自

覺」，「這一也可稱之為自虐的反省方式，便風行於六十年代末的學生『鬥士』們中間。」在這種情緒裡邊匯聚著這樣兩種真誠，一種屬於存在主義的觀念，即認定存在的本質即是不斷地自我否定和超越，還有便是認定，在趨赴「革命」的同時，須得對自己作為大學生的那份特權和地位作出批判。集結於山嶽基地的年青人們便認定，這種普遍共有的情緒，即是「共產主義化」的一種方式，他們將它進一步絕對化，從而接受了領袖人物所要求的徹底否定自我的主張。此時的「自我否定，即所謂『總括』」，便這樣，以一種毫不顧及「個人意志、意圖，及成為其端緒的理由和原因等因素，一味向外敞開自己的自律性的反省機制，展現在了他們的面前。」（北田曉大：《遭人嗤笑的日本「民粹主義」》）

自我否定之前，更有甚者，便由於一味地希望、等待著自我否定，於是，這樣的機制，便無休無止地運作著。當初，為了建立連合赤軍，他們進行了聯合訓練，那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事，位於有日本南阿爾卑斯之稱的一處名叫新倉的深山老林裡，隨即便在這裡發生了永田對遠山的批評和責難，以此為契機，森恆夫便打出了「共產主義化」的綱領，一時間，集體內部便趨於高度緊張的境況。接著，自十二月下旬起，開始了在榛名山的聯合訓練，他們也便成了被要求在同伴間挨個兒「總括」的目標，一旦被認定為自我否定得並不徹底，便勢必遭受到

來自集體的施暴。

新倉的犧牲者，最早出現於十二月末，由此直至翌年，暴力呈加速度逐級上升的趨勢，僅一個來月，就已有十二個成員遭到同伴的施暴、折磨而慘死。森恆夫的幹部們將他們的慘死看作是因為拒絕徹底的「共產主義化」所致，稱他們是「失敗而死」，從而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整個組織便越發朝著殺害同伴的危險道路長驅直入。

由於這一慘烈的過程，以及無人出來加以制止的局面，令所有的人都為之陷入了黯然和絕望之境，故而憧憬著新左翼的人們，他們所持有的美好期待，便被這整個事件給徹底地粉碎了。

豪華社會 的深淵

這樣的殺人事件，便相繼發生在了榛名山、迦葉山，這些群馬縣腹地的深山之中。而這之後，走向自我毀滅的連合赤軍的一眾人，又由妙義山，穿行於長野縣一側時，迷了路，出现在了與輕井澤的村落僅有咫尺之隔的地方。

而一連串事件的終結，便是這淺間山莊事件了。這發生在距離輕井澤車站還不到十分鐘車程的輕井澤別墅分售宅地的事件，其真實情況，與許多人所懷持的

尾聲

孤立的北

朝鮮

一九九〇年代以來，日本戰後體制在經濟、文化、軍事等諸多層面，迅速地趨於崩潰和解體。一方面，隨著日本企業的海外拓展，以及商貿、旅遊觀光客的走向世界各地，支撐起整個戰後日本的國內產業開始趨於空洞化；另一方面，隨著自衛隊的派遣海外以及被整編為全球化軍事秩序的組成部分，奠定了戰後日本基調並構成了「日美安保」前提的憲法也因此而趨於空洞化；兩者恰好顯得極為相似。應該如何命名這一業已彰顯在了我們眼前的新的社會及其體制？是稱其為「後戰後」呢？還是斷定其早已屬於「後後戰後」，抑或更合適些？顯而易見，在這一系列的結構性變化中，作為歷史的主體，「美國」始終要比「日本」發揮著更為強有力的作用。

然而，諸如此類的，存在的框架始終須得由「美國」來擬定的情況，不僅在日本是如此，在韓國、台灣、菲律賓這些自冷戰時期以來便已深受美國影響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甚至包括一眼看去似與美國處於對峙兩極的北朝鮮在內，毋庸置疑，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其自身的存在，也無一不是越來越嚴重地依賴於它們

之與美國的關係。

的確，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北朝鮮始終是以某種迥異於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世界性的構圖，來確立其自身的存在的。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這個國家屢屢製造了針對日本和韓國的人質綁架事件，並進而在一九八三年，對正在緬甸訪問的韓國總統一行實施了炸彈襲擊；一九八七年，更是策劃了大韓航空飛機爆炸事件，致使機上一百一十五名乘客全部遇難。毫無疑問，這一時期的北朝鮮，乃是一個內含恐怖主義的危險國家。

不過，九十年代以來，北朝鮮已充分意識到，惟有通過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才有可能謀取自己的生存。一九八九年，匈牙利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是東歐各國與韓國實現邦交正常化的一種趨勢。一九九〇年，韓國與蘇聯建交。一九九二年，韓國與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隨著對冷戰體制的超越和擺脫，不費吹灰之力，便宣告了蘇聯的分崩瓦解，而中國也開始迅速走向市場經濟。周邊世界的變化，使北朝鮮強烈地感覺到了某種被拋棄的孤獨。

不過，北朝鮮也並沒有因此而作出以與日本、韓國切實對話而謀取關係改善的抉擇。一九九〇年，以金丸率團訪朝為契機，北朝鮮本已與日本就邦交正常化展開交涉，只是這一交涉持續了兩年便遽告中斷了，原因不僅僅是核疑慮的難以消除，還在於雙方就綁架問題難以達成協議。就在這同一時期，朝鮮半島的南北



首腦會談後，在「日朝共同聲明」上簽字並相互握手的小泉純一郎首相與北朝鮮總書記金正日。（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七日，每日新聞社）

對話也在嘗試進行著，至一九九二年末，則由北朝鮮方面中止了這場對話。

隨後，到了一九九三年，北朝鮮突然宣佈退出NPT（核不擴散條約），將自身的生死存亡抵押在了鈹而走險一途，準備以此在外交上與美國賭上一把。一九九四年六月，北朝鮮發表聲明，聲稱IAEA（國際核能機構）勒令其即時退出該組織並對其實施「制裁」，不啻是對北朝鮮的宣戰，並因此而驅逐了IAEA派往修建有核設施的寧邊的調查官員。美、朝關係陡然變得極度緊張，幾乎已被逼至戰爭的邊緣。此一危機的得以化解，端賴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到訪以及與金日成主席的會談。北朝鮮以中止核開發為條件，換取由美國所提供的輕水爐。這看似是北朝鮮鈹而走險的外交最後獲得了「勝利」，但中間只需有一步的差錯，整個朝鮮半島將無可挽回地淪為戰場。

其後不久，金日成因病去世，北朝鮮的獨裁體制遂直接為其兒子金正日所繼承。這之後，北朝鮮以發射導彈與修建金昌里地下設施等舉措，繼續與美國展開其鈹而走險的外交周旋，萬不得已之時，則也會作出一定程度的讓步。

「美國」 這道鎖卡

九十年代以來，北朝鮮所出示的對外政策，無非是這麼兩條，即「核」與「導彈」，乍一看，都是反美的，並且頗具破壞性，但其實，卻徹頭徹尾地貫穿了對美關係的重視。在北朝鮮領導者看來，日本、韓國之於美國，都只會唯命是從，始終讓「美國」這道鎖卡給拴著，誰若無視美國的意向，誰也便會寸步難行；唯有北朝鮮自己，才絕對是真正能與美國交涉的對手，正因為如此，未來的東北亞將直接取決於自己之與美國政策的關係。他們便一直是這樣在強化著這一自我設定的。（李鍾元等編：《日朝交涉》）

儘管憑藉其鋌而走險的外交手腕，北朝鮮從美國政府那裡贏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正因為這一重緣故，致使美國與北朝鮮之間的關係，正持續不斷地、變本加厲地成為複製冷戰體制的一個縮影。如果說，以沖繩為媒介的日、美關係，乃是對美國維持其在東亞的軍事霸權的圖景的一種「正面」勾勒，那麼，正在孕育著危機的美、朝關係，則儼然可以說是這一圖景的「負面」勾勒了。

走向後戰 後史

二〇〇二年九月，小泉首相閃電般地訪問了朝鮮，一定程度上確實創造了歷史，但尚不足以能讓被「美國」這道鎖卡給拴住了的東北亞的冷戰結構終至有所改觀。布殊政府成立的當初，曾將北朝鮮與

伊拉克相提並論，宣佈其為「邪惡軸心國家」，並以顛覆其政權作為自己的目標。小泉的訪朝與美國的這一動向恰好處在同一個時段，那麼，日本首相這一罕見的英明果斷之舉，果真能為東北亞的歷史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嗎？人們不禁都有所期待著。然而，接下來，日本國內洶湧澎湃的大眾傳媒與民情輿論，卻將興趣點全都集中在在了首腦會談中已由金正日總書記所挑明了的綁架日本人的事實上，紛紛要求盡快促成被綁架者的歸國以及將受害人交還給他們家人，潮流所趨，致使有關小泉訪朝以及六方會談所具有的政治可能性的討論，幾乎被湮沒不彰。另外，布殊政府當初對北朝鮮發出的強硬論調，也隨著其執政期的延伸而有所收斂，有關北朝鮮的政策明顯出現了緩和的跡象。

二〇〇八年秋，全球金融泡沫破裂，一場堪稱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最為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襲擊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世界。伊拉克戰爭的失敗與長達八年之久的布殊政權的失策所招致的不信任感，在美國國民中間四處蔓延。該年的十一月四日，一名非洲裔美國人被推舉為總統候選人，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巴拉克·奧巴馬當選成為新一屆的總統，執「NEOCON」之牛耳的布殊政權的政策，總該因此而作出重大轉向了吧？但其實不然，美國在亞洲的基本戰略，並不會因為誰出任總統便可以根本改變的。為了繼續維持其在亞洲的強大影響力，美國除了

在軍事上繼續以沖繩作為其最大的戰略基地，並且還似乎毫不懈怠地始終保持著其對日本、韓國和中國的警戒之心，唯恐其加強協作以排除美國。在這一過程中，以怎樣的方式處置並最終解決北朝鮮的問題，對該地區說來便具有了格外重大的意義。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種全球化並非只是石頭一塊，它所面向的乃是性質各異的多元化的未來。不妨可以試著將之劃分為這樣的兩極，一極是金融的全球化以及以與美國之間的同盟——依存關係為軸心的地平線；另一極則是一條多極性的地平線，是為數眾多的市民以及國際性的跨國聯合；這當然僅僅是理念意義上的一種劃分，將其中的一方稱之為「帝國」也好，另一方稱之為「大眾」也罷，但在現實中兩者卻有著彼此的交叉和重疊，人物、組織與活動也時常會纏繞在一起。現有的國民國家，在支持或聲援著前者的全球化進程的同時，卻往往又顯得步履蹣跚，隨時都有可能跌倒在地，終至，這些為名目繁多的全球化進程所簸落下來的為數甚眾的人們，他們一來到這個世上，便注定了人生是空洞的，閉塞的，已經走到了盡頭的。

從本書所已述及的歷史來看，這第三條地平線，即為「全球化」這一地平線所無法裹挾和包攝的、為數甚眾的人們的聲音與心情，將如何去與那個一體化的世界發生關聯？還有，究竟應該由怎樣的歷史主體，才能成功地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這，正是二十一世紀孤注一擲所要解決的問題。

後記

所謂歷史，與其說是時間性的，毋寧說更是空間性的。各種各樣的經驗與各種各樣的地域彼此關聯在一起。統治、反抗、威脅利誘、剝削壓迫、交流、合作、遷移，諸如此類，它們被以無限多樣的方式，關聯、糾結在了一起。所謂歷史，便是對這一空間所作的盡可能廣泛的記述，單一的「通史」並不存在。

我認為，在現代的每一個階段，國民國家與帝國、殖民地及資本主義之間，都會有諸多巨大的體系與組織在那兒蠢蠢欲動著，並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而諸如所謂的日本史，便作為一種連續的時間性的歷史，從這中間浮現了出來。正因如此，日本史的存在，或許根本就帶有某種虛構性，是被作了抽象化處理的。因而，人們在談論日本史的時候，須得對這份抽象的危險，保持必要的敏感。

構成本書主題的，是曾經被這樣建構起來的日本現、當代的时间和主體，其自我崩潰和瓦解的整個過程。雖然全球化是促成這一過程的最大契機，但從國內的立場看，貫穿整個經濟高速增长時期的開發，即由地域開發到休閒遊樂場地的開發，這一潮流曾致使列島的自然生態遭受了嚴重破壞，而產業也因此而被逼至空洞化的窘境。家庭層面上，將自己封閉在廣袤千里的郊外的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致使年青一代的內在精神自我趨於空洞。新自由主義則打破了「富裕」的幻

想，並向我們強行出示了一個兩極分化的「差別」性現實。

從「戰後」到「後戰後」的輪迴，並非是同一個日本史內部的階段性的變遷，毋寧說，是上述那種歷史主體的不證自明性所呈現出的動搖，以及正趨於空洞化。雖然我們並不想放棄談論「歷史」的實踐和體驗，但我們所置身的卻是一個「日本史」已變得難以成立的時代。

因而，本書並不算依照平日所司空見慣的思路，即「美元危機與石油衝擊」、「日中邦交正常化」、「從高速增长到穩定增長」、「從昭和到平成」、「泡沫經濟與平成蕭條」、「五五年體制的崩潰」，諸如此類的帶有時間的連續性的變化軌跡來談論歷史，這是因為考慮到，那種所謂的連續性，其本身實際上正是需要被追問的。自七十年代中期以來，此類在以往一直被當作連續體看待的歷史是如何被解構了的？本書嘗試從多個方面就此加以思考。整個研究雖力求謹守政治史、經濟史記述的畛域，但還是期待著各個領域的專家，能以其他的方式，就這些問題重新加以探討。

最後，謹向編輯部的上田麻里氏表示由衷的感謝，儘管允諾的脫稿日期一再、再而三地被延遲，但卻依然極為耐心地與著者保持溝通並給予支持。本書終於得以上梓，這完全是上田氏的功勞。

吉見俊哉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